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34(2000)01-0083-(08)

近十年的“左联”研究状况

——纪念“左联”成立70周年

悠 悠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 要: 近十年来学术界对“左联”的历史评价、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方向、创作成果、重大论争以及历史资料的一些考证情况, 分别作了回溯、分析梳理和综述。

关键词: “左联”; 历史评价; 文艺思潮; 学术论争

近十年来, 由于思想路线的进一步解放, 学术界对“左联”的研究和认识, 也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例如, 对“左联”的历史评价的重估; “左翼十年”的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方向的讨论; “左联”创作成果的回顾; “左联”和其他文学团体的几次重大论争, 以及历史资料的一些考证, 都有了新的进展。现将这些研究成果予以分析和综述, 以促进“左联”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一、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

“左联”自成立时起就带有明显的“左”倾毛病。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理论纲领》中就明确写着: “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 反资产阶级的, 又反‘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他们把资产阶级, 甚至小

资产阶级都作为打击对象, 分明是极左思想的表现。然而, 在“左联”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这种错误思想不但没有得到纠正, 反而不断发展, 日趋严重。1930年8月“左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决议中, 对中国革命高潮的分析以及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情势和任务的阐述, 都反映“左联”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倾向, 而且还强调“特别要和右的倾向作斗争”。决议公布之时, 正是立三路线全盛时期, 因此, 这决议显然是立三路线的产物。^①因此, 关于“左联”评价以及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向问题, 尽管众说纷纭, 但都是围绕着对“左联”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进行的。

周葱秀在《前进中的困惑——30年代左翼文艺错误消长的扫描》一文中, 从左翼

收稿日期: 1999-05-06

作者简介: 悠 悠(1951-), 男, 满族, 湖北江陵人, 上海师范大学工作, 副编审。

文坛的错误消长这一角度,论述左翼文艺运动的得失。指出,左翼文坛产生过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机械论、庸俗社会学。另一方面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其产生的根源不全相同。因此,它们的消长变化,也不完全是同步的。这些错误,一直延续到1935年。其时,在文艺战线上结成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深层次问题才被“左联”有所认识。这表现在肖三于1935年8月11日致“左联”的信中。1936年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就是将这种认识付诸实践。“解散‘左联’应该说是克服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一步。党的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后,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清算才更自觉、更彻底。到了这一阶段,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才算得到最后的清算和克服。”^②

左翼文学运动在1928年勃兴以后的四、五年间,形成了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方法,其受影响最深的理论,主要是日本的福本主义。1931年到1933年,主要是苏联的“拉普”的文艺思想,福本主义和拉普都否定文学是复杂的活生生的现实通过作家深邃的精神世界的审美反映,简单地用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为了政治而舍弃了艺术,这当然是违背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的。但这些在左翼文学界形成一股思潮。加上党内左倾路线也起了作用,左翼文坛出现了不少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另外,“左联”相当强调理论建设和指导意义是对的,但却忽视了作家对实际生活的感受、体验、把握。此外,由于重视重要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题材,而忽略了对题材的开掘,从而忽略了文学特殊职能、特殊作用。

关于如何评价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的这些问题,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具体历史

说”。这种观念认为,左翼文学运动是与广大劳苦群众共同存在,一起滋长壮大的。“应是我们评价左翼文学的前提。反之,如果我们离开新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和三十年代的现实,那么我们对左翼文学的一切毁誉臧否都将是没有根据的。”由于30年代开始了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新时期,所以,在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既是五四新文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时代的要求。而且,30年代左翼文艺的兴盛还有其特定的国际背景。在这些具体历史条件下,才使左翼文学运动的导向出现了一些偏差。

而且,到了1933年11月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的发表,左翼文学总的理论导向发生了变化。并且,“坚持无产阶级战斗方向的左翼文艺终于在艺术上臻于成熟。”这一历史“告诉我们,左翼文学的弱点并不是它与现实革命斗争联系密切而造成的”。^③

对“左联”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有研究者认为,它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一种“适应社会变革期的文学。”^④认为“左联”努力使文学适应社会变革期的变化。“左联”最大的失误是所谓“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它没有团结更广泛的“左翼之外的文学者作家”,其结果是1936年随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的提出,“左联”自行解散,这不仅伤害了广大文学工作者的感情,也挫伤了左翼作家的积极性。

二、左翼十年的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

关于“左联”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潮,以及“左翼十年”的新现实主义文艺思潮。最主要的研究成果反映在邵伯周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一书中。其中的一些观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上的突破。例如,他认

为:以老舍、巴金、曹禺、沈从文等为代表的不同形态的现实主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的“重要组成部分”。^⑤

“左联”前期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自然并不仅仅体现与几篇专谈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当时几乎所有关于倡导与阐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文章都共同一致地反对浪漫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为革命文学创作不容怀疑的铁的法则,以至将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中出现的问题归之为浪漫主义。”^⑥此外,在现实主义问题上左翼作家们又共同一致地批判以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传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与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中寻找现实主义新内容。

汪正龙认为:“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理论界并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文学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即革命文学的文学价值关系问题”^⑦,革命文学既在文学表象生活上与一般大众生活、生活经验隔了一层,又以对多元价值情感体验的共振的忽视延滞了价值关系的丰富性发生。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现象,即认为文学的价值就是政治价值即有关价值,又把文学与社会的联系看得仿佛只由作者的认识水平决定,既高擎读者大众的地位,又对读者的特点、阅读心理极其与文学作品相应特性的关系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一味从阶级价值理想的一致上考虑问题,“大众”只是政治上依赖的主要力量的一个代名词。

30年代,我国左翼现实主义,开始了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一席地位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一段幼稚、成熟到深化的发展历程。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经1930年的“左联”成立,到1932年创作的一度丰收,比较清晰地显示出左翼现实主义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前进轨迹。^⑧“革命文学”的论争引发的对马

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论的译介,对左翼现实主义起了正面的促进作用,论争中的错误引导而产生的文学创作,却是从反面刺激了左翼现实主义的推进。到1933年,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已表现出某种深化的趋势,在这个阶段,已使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占有文坛的主导地位了。

林伟民认为:左翼文学对“五四”现实主义传统是一种背离与超越。“左翼文艺运动在政治化进程中,一方面顺应历史与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割绝与‘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联系,从而使新文学在“文学与生活”和“文学与政治”的两难选择中曲折前进。”^⑨左翼作家面临着双重困惑:在文学观念上,是文学的真实性与政治的倾向性的冲突;文学创作上,是非审美的功利观与审美意识的冲突。“左联”前期,文学创作存在着不景气的现象。“左联”后期,现实主义复归,文学创作在写熟悉题材、个体形象塑造和典型化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并且使左翼文化朝着政治化、社会化、理想化方向完成对“五四”现实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的历史使命。

三、“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评价

关于“左联”时期的文学创作情形,许多研究者进行了多方位多视角的研究。

有人认为,“左联”时期对报告文学的理论研讨,接触到了报告文学本体的一些基本方面,对报告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论述阐发。这些理论上的研讨对我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更使报告文学获得一种文学本体的自觉意识,而促使了“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⑩

“左联”时期的女性文学,也有专门的论述:左翼女性文学的根本特征:性别淡化。即因为女子的解放方向是通过消除阶级压迫和民族剥削因素,为女性自救铲除外在障碍,从而超越女性个体,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在五四时期打破沉寂后,又经历了“左联”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左翼女性文学女性意识较五四时代有所变异。女性意识在“左联”发生转型——无性化或雄化。当然,“无性化”一词在此并非简单的性别气质消失,“雄化”也并非指性别的简单位移,而是显示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人类的一种有意无意的“共识现象”^⑧。

在30年代,出现了一批反映苏区的作品,许多左翼作家以炽热的革命激情讴歌苏维埃红色政权,描绘了势如燎原的土地革命,揭示出在革命浪涛冲击下,农民觉醒和一代新人的成长,为革命文学输入新鲜血液。“左联”创作题材这一新开拓——30年代的反映苏区的作品,长期以来,在现代文学史上缺乏系统论述。终于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从历史出发,把它纳入当时政治和文学背景下审视。总结它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经验。

研究者认为:30年代出现的这批反映苏区的作品有其不可低估意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竭力推行腐朽的法西斯文化和淫靡的黄色文化,用以抵制革命思想的传播,构成他们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严重关头,革命作家表现了对政治的自觉服从,试图描绘出苏维埃政权艰辛缔造的历程,塑造了觉醒起来的农民形象,汇成左翼文艺主潮,冲破白色恐怖的气氛,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宣传作用。“30年代这批反映苏区作品,由于作者生活积蓄厚薄和文学修养高地,思想水平参差不齐,但总的来看,它属于从革命的浪漫蒂克向革命现实主义过渡的作品,比之早期的‘普罗’文学,艺术已经有较大进展。”^⑨

左翼十年间的中国游记文学创作,作为“左联”时期的一个分支,得到了新的肯定。姜静楠认为:“本时期的的纪游性作品,大多克服了前一时期(即1917年—1927年)的

艺术弱点,在前一时期创作实践所提供的历史基础上趋向成熟,又在艺术上取得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发展、新创造、新形式,以及某些新特点。”^⑩本时期的纪游文学往往更充分地表现出作者们的高层次知识结构与审美情趣,产生出许多博识与精鉴较完美结合起来的优秀之作。

在30年代的左翼诗潮与现代主义诗潮的研究中,^⑪张同道论述道:美学思潮有两种,即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以蒋光慈、殷夫为代表的“左联”诗歌,以穆木天、蒲风为代表的中国诗歌会大众化诗歌及国防诗歌和臧克家、艾青、田间的左翼诗歌,构成了现实主义诗歌主潮。他们用诗歌发出火的呐喊;以戴望舒、施蛰存为代表的《现代》杂志诗歌和卞之琳、何其芳等人的诗歌构筑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生以来的一个高峰,他们在象牙塔里精心推敲诗艺,诗歌宛如梦的呢喃。三股左翼现实主义诗歌力量拥有共同诗学意识,即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歌面对生活,反映现实;诗学主题也比较接近,维护人民利益,讴歌进步力量,反抗黑暗统治。然而,对于生活理解的程度与思考的深度区分了他们之间诗学主题内蕴的丰厚与贫弱。而诗歌美学风格的不同形态,也呈现了由简陋到复杂、由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对“左翼十年”的文学创作的研究,在其他方面也有进展,例如,关于“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和“宣传鼓动说”的研究,这两个观念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是当代研究“左联”文学观念、文学主张的关键。^⑫

四、“左联”与论语派和胡秋原的论争

整个30年代文学是主流与非主流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惟有把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艺运动置于整个30年代文学之中,才有可能揭示出“左联”的时代价值,而“左

联”与其他一些文学团体的历史联系,包括论争和分歧,正是“左联”与30年代文学”这一母题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左联”,特别是前期“左联”,组织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思想上流露出惟我独尊的情绪,理论上带有教条主义的印记,这也是无庸讳言的。正如鲁迅先生精辟地指出:当时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家,有许多实际上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只是从书本上学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能够和实际结合,和群众打成一片。“左联”的这些局限突出表现在他们对论语派、“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上。

以林语堂为首的论语派,是以不左不右的姿态踏上文坛的。从“左联”的角度来看,论语派、新月派等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而实际上,论语派在主观上不是以“左联”的对立物出现。然而,过去的许多论著恰恰忽略了这一点。^⑩实际上《论语》的矛头是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的。所以,在暴露现实这一点来看,论语派与“左联”站在同一阵线上。以鲁迅为首的“左联”作家曾经尖锐地批判过论语派。要说清楚的是,这次论战是“左联”方面发动的,根本不属于当年的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范畴之内,因此,过去的一些论著把“对论语派的批判”列入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范畴显然不符合史实,而把论语派斥之为参加文化“围剿”的一支“反动的别动队”,更是离题太远了。

即使由于“左联”作家对论语派的批判,而使两者成为对立的“论敌”,那么也不应以这种“论敌”关系来概括“左联”与论语派的整个历史联系。因为,“论敌”关系只是它们的历史联系中的一个阶段。准确地说,盟友—论敌—盟友,这是“左联”方面与论语派关系发展的三个阶段。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正位—错位—正位”的反复,为现在和将来的

文学发展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1935年以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时代赋予中国人民最迫切的任务。1935年11月8日,肖三《给“左联”的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把林语堂列为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肖三在肯定林语堂的同时,批评了“左联”工作中的错误,他说:“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来。”肖三的信指明了“左联”对论语派的策略导向。于是,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召唤下,“左联”与论语派重新恢复了盟友的关系。

“左联”与自由人代表人物胡秋原的论争也有研究者进行了历史反思。^⑪《文化评论》主编胡秋原。他执笔写的《艺术非至上》一文中,提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这种主张代表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由是,“左联”为了维护文学是阶级斗争工具这一崇高使命,为了使文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这一理论不被动摇,与“自由人”展开了一年有余的激烈论争。孤立地看“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这一句话,的确宣扬的是一种超阶级的文艺观,背离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社会中文艺具有阶级性”的论断,抹煞了文学的意识形态特征。然而,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

吴家荣认为:从自由人对国民党高压政策的揭露与批判及对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声讨上,从他们当时坚持反专制、反独裁的进步主张看,自由人确实与“左联”的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而能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取同一步调。虽然,我们不否认自由人

始终没有脱离他所代表的自由资产阶级立场,但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自由人无疑是“左联”政治上的同路人而非敌对的一帮。况且自由人文艺观的合理成份,不管其出发点如何,确有利于“左联”纠正教条主义理论的偏颇,能使自己更快地成熟起来。可是,左翼理论家于论争一开始就将自由人视为敌类,必欲彻底清除而后快,且对自由人的观点不是一分为二,而是全盘否定。左翼理论家抡起批判的大斧,对自由人的一切言论都横而伐之,这种过火的批判,当然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副作用。首先是加剧了“左联”与“左联”外作家的对立情绪,助长“左联”关门主义的倾向。

“左联”的这些争论,却让人明显感觉到有着“惟我独尊”的味道,听不得别人的批评意见,从而使一些非左翼作家心寒失望。“左联”以自己的极左行为为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攻击自己的口实,陷自己于被动之中,从而干扰了“左联”竭尽全力地打击最险恶的敌人。“左联”这些过火批判的“左”的错误,与30年代初期,党中央在政治上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随着“左”倾路线在党内不断被揭露清算,不少“左联”同志也开始自觉反省这一时期的斗争,逐渐认识到自身的“左”倾错误。冯雪峰承认“左翼的批评家往往犯有机械论(理论上)和左倾宗派主义(策略上)的错误。”对“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应持“友人”态度,号召为着壮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阵营,创造新的文化,“左联”要团结一切进步文学家、作家一同走,这才是“我们的公然的战斗态度”。

五、关于“左联”资料研究

关于“左联”资料的发掘和研究,是近十年来“左联”研究中收获颇丰的一个方面。例如冯雪峰、鲁迅^⑤、夏衍^⑥、马子华^⑦、周文^⑧、

瞿秋白^⑨等人与“左联”联系,例如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⑩、“左联”时期的潮籍作家^⑪等等。马子华是“左联”中屈指可数的云南作家之一,在创作方面取得为人瞩目的成就,赢得“优秀乡土作家”的称号。关于瞿秋白,有研究者认为,“左联”摆脱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应该以1931年11月的决议为标志。这一决议的形成,正是瞿秋白亲自参与的结果,这也是瞿秋白1931年重返文坛的第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思想与行动,为“左联”从挫折走向胜利作出了不应忘记的贡献。

关于冯雪峰与中国左翼文艺的关系,有研究者认为,冯雪峰在筹建和领导“左联”方面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主持“左联”工作后,还为纠正和克服“左联”存在的“左”的倾向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⑫冯雪峰无疑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但由于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实际的理论家,在严酷的斗争面前,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左”倾路线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危害。因此,他出任“左联”党团书记以后,下决心要纠正这种“左”的倾向。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由冯雪峰执笔起草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对于1930年8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在左翼文艺运动中,他也曾有过缺点、错误。比如在批评左倾宗派主义的时候,有时自己也流露出明显的宗派主义情绪。又比如他对文艺问题,诸如文艺的阶级性、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政治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也有不尽正确的地方。

关于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以及他们的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的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蒋明玳从文学史发展的宏观角度,分析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有其自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批青年作家扎

实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鲁迅等前辈作家的关怀、提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建设;整个世界进步文学的潮流对中国左翼文坛的影响。^①在3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却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历史沉重感,大革命的失败以及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政治事变所产生的强大反作用力,使“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时期宣告结束,新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急遽地整体性嬗变:一方面,严峻的社会现实迫使作家们的创作自由感由个人感情生活的狭小天地转向集体社会生活的广阔世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分道扬镳,崇尚客观再现称谓30年代据主导地位的文学风气;另一方面,为顺应社会和政治形势的需要,在“文学要成为无产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之一翼”的主张下,新文学创作,更加峻急地参与现实生活,并显示出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左翼文学被紧紧地连接在政治斗争的脐带上。

对周扬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1933年前后,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终于突破了重重障碍,真正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这种转变首先是从理论上取得突破的。1933年1月,周扬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一文,在左翼文坛激起巨大反响,这篇文章奠定了30年代左翼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础。周扬的文章代表了中国革命对现实主义的典型必须从本质上反映社会动向和历史趋势,这对于引导当时左翼作家正确观察和反映生活,无疑是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的,在相当一个时期成为指导我国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的权威性论点。^②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篇章——东北沦陷时期左翼文学活动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开拓性。研究者认为,东北沦陷期的左翼文学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在殖民化高压政策的统治下,带着沉痛的忧患和执着的韧

性活动着、发展着,东北沦陷期左翼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的、曲折的过程。东北沦陷期左翼作家们由于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历史的局限,个人具体处境不一,在文学创作上必然产生一定的差异。但就其思想感情、创作倾向、反映题材与主题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大都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文学青年,都经历了家乡沦陷的痛苦,切身体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使他们内心萌发了一种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倾泄着一个共同的情感,那就是对家乡的沦陷深感痛苦和悲愤。^③

其他关于“左联”资料的考证,也很有新的进展。例如廓清中共对“左翼十年”起了什么领导作用,1927年至1930年,中共如何领导成立“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情况新考证。^④例如,对“左联”后期受到的国际支持和进行的交流活动中,三封重要的信的研究。^⑤这包括世界各国作家对中国焚书坑儒的抗议信、中国“文总”致全世界著名作家的信、国际革命戏剧家同盟给中国“剧联”的信等。

注释:

①②周蕙秀:《前进中的困惑——30年代左翼文艺错误消长的扫描》,《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南昌)1992年第1期,18-23。

③王铁仙:《如何评价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上海文论》,1990年第3期。

④⑤王愚:《“左联”经验——适应社会变革期的文学》,《延安文艺研究》,1990年第3期,67-70,63。《从“左联”到“讲话”——文学对社会变革的适应》,《唐都学刊》1990年第4期。

⑥邵伯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40-45。

⑦汪正龙:《评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理论界关于文学和读者大众关系的理论》,《湖北大学学报》(武汉),

1990年第5期,7-11。

⑧王文英:《“左联”现实主义文学的演变轨迹》,《上海文论》,1990年第3期,21-27。

⑨林伟民:《左翼文学:“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背离与超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66-73。

⑩唐鸿棣:《略论“左联”对报告文学的介绍和理论研讨》,《贵州社会科学》(贵阳),1990年第12期,25-29。

⑪莲子:《简论“左联”时期女性文学》,《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4-18。

⑫柯文溥:《“左联”创作题材的新开拓——论30年代的反映苏区作品》,《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103-107,132。

⑬姜静楠:《左翼十年间中国游记文学的兴盛与白色政治恐怖》,《山东社会科学》(济南),1992年第1期,50-54。

⑭张同道:《火的呐喊与梦的呢喃——三十年代的左翼诗潮与现代主义诗潮》,《文艺评论》(京),1997年第1期。

⑮何云贵,胡润森:《“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和“宣传鼓动说”》,《镇江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26-31。

⑯施建伟:《“左联”与论语派》,《社会科学》(沪),1991年第3期,64-68。

⑰吴家荣:《“左联”与胡秋原的论争及其历史反思》,《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92年第4期,258-265。

⑱张能耿:《鲁迅与周恩来的革命友谊》,《浙江学刊》,1998年第2期,19-21;蒋成德:《鲁迅倡导革命文艺运动的重要途径:编辑历程三十年纵观》,《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30-35,等等。

⑲丁晓原:《夏衍对报告文学的译介倡导和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105;《夏衍报告文学漫议》,《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6-8,等等。

⑳陈思清:《马子华与“左联”》,《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0(1)期,105-110。

㉑之丹:《大众化: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纪念周文诞辰90周年》,《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4(2)期,16-18;李忠全:《周文学术研讨会综述》,《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14(2)期,36-38。

㉒张小红:《瞿秋白与“左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13-18。

㉓蒋明玳:《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3期。

㉔饶蓬子:《“左联”时期的潮籍作家》,《文史知识》,1997年第9期,113-116。

㉕李兵:《冯雪峰与中国左翼文艺》,《上海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31-37。

㉖蒋明玳:《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崛起的社会历史原因》,《扬州师院学报》,1992年1期,85-93。

㉗蒋明玳:《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1期,11-17。

㉘刘慧娟、徐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篇章——简述东北沦陷时期左翼文学活动》,《佳木斯师专学报》,1992年第2期,15-22。

㉙余信红:《关于中共领导“左联”成立问题考证》,《长白学刊》,1997年第3期,66-70。

㉚孔海珠:《“左联”后期重要的国际支持和交流:关于不可湮没的三封信探究》,《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175-187。

A Summary of 10 Years' Studies on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Alliance

You You

Abstract: In the past 10 years, there have been many new developments and discoveries about the study of Left-Wing Writers Alliance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a and com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researches.

Key words: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Alliance; 10 years; summarization